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
(下卷)

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
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
关系形态论

黄枝连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
(下卷)

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
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
关系形态论

袁世英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 下卷: 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 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 / 黄枝连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12

ISBN 7-300-02006-2/K·206

I. 天...

I. 黄...

II. 朝鲜-中世纪史

N. K3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1936 号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 (下卷)

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

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

黄枝连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125 插页 6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46 000 册数: 1-2 500

定价: 15.50 元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黄枝连教授，祖籍福建漳浦，1939年4月生于英属马来亚。1958年秋，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主修历史，副修哲学；1962年秋，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至哈佛大学深造，主修东亚近代史，副修社会学和政治学。

黄枝连教授于1964年秋返回香港，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教授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和西方社会思想等课程。1968年秋前往新加坡南洋大学（现被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南亚华人史和东南亚文化史。期间，带领学生进行大量关于新马两地华族社会与历史的调查研究，撰写近三十份学术报告，对于当地的华人研究产生深远的作用。斯时，他还在《星洲日报》撰写社论。

1972年秋以来，黄枝连教授任教于香港浸会学院社会学系，担任过系主任；教授过大量社会学和未来学的课程。

黄枝连教授于1994年8月受聘为兰州大学“客座教授”；10月获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颁发的“荣誉博士”证书。

黄枝连教授与香港的一些专业人士和企业界人士于1985年8月组织了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致力于推动关于亚洲—太平洋地区二十一世纪发展策略及其前景的专业交流协作的活动。已经赞助过《中华经济协作系统》、《亚洲西南大陆桥》、《亚欧大陆桥》等发展协作系统的大型国际研讨活动。

黄枝连教授年以来以“跨越学科、跨越文化、跨越时空”的大取向，对中国和亚太地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大计进行调查研究；并且撰写了大量有关的文章和专著。

国际关系形态更替的动乱与希望

——“天朝礼治体系”崩溃前后，东亚地区 新秩序的探索 [代序]

黄枝连

本文大纲：

前言：把学术研究成果交给历史去评判

一、对“天朝礼治体系”内政和外事层面的探索

二、“文明的偏见”下，朝鲜人对女真人挑战的错乱反应

三、“义理派”和“拘糜派”较量下，朝鲜王朝对满清王朝关系中的两个极端主义

四、国际关系形态中的“五理系统”的处理方式

五、西方资本主义及“美式文明”对“天朝礼治体系”的“最后一击”

六、东北亚文明抉择的“天路历程”：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及于 21 世纪

七、中国的抉择：从“天朝礼治体系”到“f”字形发展战略的开发利用

后语：关于《国际关系形态研究》的“三个跨越”取向

《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是《天明礼治体系研究》丛书的最后一卷；上卷是《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关系形态论》，中卷是《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

67292/22

10

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形态论》。

前言：把学术研究成果交给历史去评判

这么一个庞大研究计划的完成，既然是各个方面的人士和作者都为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是应该表现在下列的一些方面：

——对于历史上存在过的中国与东亚地区（特别是对朝鲜半岛）关系的结构、功能、运作方式及其活动规律，都能有所勾画；让人们可以对它的“来龙去脉”有所认识；

——这个高度的概括，亦是有助于人们了解东亚（准确地说 是东北亚）地区目前形势的真相及其动向的；不仅如此……

——《研究》更有助于人们探索走向 21 世纪东亚地区的新秩序—新格局所可能出现的前景；

——这样的学术工夫，可以引发许多新的学术探讨活动……

一、对“天朝礼治体系”内政和外事层面的探索

上卷收集了六篇论文，探讨北魏王朝及朝鲜王朝如何利用以儒学—儒道—儒术为其主要内容的礼治主义，来对它们的社会情境结构进行改造；以便进一步推进其农业—农村—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文化生活。再及于琉球王朝与郑和下西洋所及的南洋（东南亚地区）和西洋（今印度洋地区）等处的社会，由于不以小农经济为其社会基础，对于礼治主义并无加以吸收的动机与动力。最后及于日本列岛以倭寇和丰臣秀吉的侵袭方式，对于施行礼治主义国家及其“天朝礼治体系”所做的挑战。

何谓“天朝礼治体系”？

简单地说，那是内部施行礼治体系的小农国家在外事活动上的一种宏观取向；而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主体的宏观框架，便成为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一种国际秩序及其相应的格局——

在这里称之为“国际关系形态”。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卷，共四章，探讨的便是朝鲜王朝建立初期和明王朝的关系；在经过一段紧张对抗的时期后，终于在15世纪中叶纳入“天朝礼治体系”的轨道。这同朝鲜王朝在内政上加速建立一个儒化情境结构的国策有密切关系，即所谓“东国年年修职责，礼义成邦慕圣朝”。因此，在“壬辰倭乱”中，明王朝不惜做出重大的牺牲，派出几十万大军带着大量的武器与粮草前往支援，它是因此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即，对于东北地区建州卫女真人的防患大计因而受到严重的削弱，为努尔哈赤的兴起及其满清政权的建立制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此可见，“天朝礼治体系”，做为一个区域性的宏观秩序架构，对于在内政上施行礼治主义和儒化政治的农业国家（如朝鲜、中国……），是一个社会发展上所不可缺少的外因。

二、“文明的偏见”下，朝鲜人对女真人挑战的错乱反应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有关国家的农业生产及其农业社会的礼治体系，容易受到来自外面或“体系外”敌对力量的袭击的——上卷和中卷所涉及的日本倭寇和丰臣秀吉的侵略，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事例；还有其他来自边疆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攻击，亦是非同小可，一样可能导致改朝换代变化的——一部中国历史，便足以说明其事的

这就是说，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在正常情况下，不但是对于中国本身（准确地说是汉族社会），还要对它的“藩邦”能够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作用；使它（们）的礼治主义的社会文化系统可以不遭受到袭击或压迫。

亦可以说，某种国际关系形态，做为一个文明体系，对于一个国家在面对“非我族类”那样的敌对性力量时（即，某意义上的“文明的冲突”），可以起着对形势分析、形势确认以及政策制

订的指导性和规范性的作用——而所谓“作用”，又是有其独特的正面和负面的结构的。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下卷的第一章《“天朝礼治体系”下，明王朝与朝鲜王朝在女真人问题上的复杂斗争：礼治主义体系对于边疆民族挑战“反应模式”的研究》，首先分析在中国东北地区、中朝边境及现俄罗斯远东省区活动的女真人，在16—17世纪的社会发展。显然地，在16世纪，他们已经进入所谓“文明时代”；而建州卫女真人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之下，还走上了农耕社会的道路。因此，汉族文化（包括其中的儒学—儒术及礼治主义）对它产生了吸引力；而这个新兴的政治集团，也开始引用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知识分子，使它的社会发展能迅速地登上一个新的历史台阶。

面对这么一个新的形势，朝鲜人以其礼治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论，马上就发现事态的不寻常之处。他们的敏锐反应是有其合理性的：即，立即采取一系列的对策来安定半岛东北与西北边境上的少数民族；分出“藩胡”和“野人”，企图在朝鲜人和女真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

可是，朝鲜人的努力是有其重大的局限性的。

最主要的是，他们继承了汉族文化中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辨”的深刻偏见，以“夷狄禽兽”来对待老乙可赤（努尔哈赤）；所谓“夷狄不可以理论，唯其所惮兵威而已”；而把对方的友好恣态，一概视之为“黠虏之积虑凶谋，猖然旁伺，欲收渔人之功者”。更糟糕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文明社会，他们竟然对这些“野蛮人”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极不文明的政策。

这种“文明的偏见”的危害性，见之于本书第二章《“天朝礼治体系”下，明王朝和朝鲜王朝在建州卫女真人问题上的混乱反应：主观—客观系统僵化对于新生力量挑战的干扰作用》，具体表现在，朝鲜王朝这个“小天朝”和明廷那个“大天朝”在女真

人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实际上，中国人在女真人问题上亦是以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来代替调查研究，因此，也拿不出一套“实事求是”的办法来对正在扩大中的“危机情境”做突破性的处理——其实，正确的说法是，正由于他们以偏见代替事实，所以才使“模糊情境”恶化，转化为“危机情境”。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天朝礼治体系”对于“非我族类”的挑战，在结构上，缺少一个灵活反应的机制；即，“大天朝”和“小天朝”的代表不可能坐下来，在平等的、就事论事的方式下，交换情报、探讨问题，从而产生一套共同的对策。所以，等到明王朝发现事态严重，派出大兵，并要求朝鲜人参加围剿行动时，后者的军队居然事先同努尔哈赤勾通，在作战时倒戈，使整个军事行动土崩瓦解。

这一来，就扩大了朝鲜王朝内部在和战问题上的矛盾，产生了“通虏派”（或曰“拘糜派”，“主和派”）和“义理派”（或曰“主战派”，“保守派”）的剧烈斗争。在一场宫廷政变中，以卫道士自居的“义理派”，拥立仁祖国王而罢免了“拘糜派”大将光海君。而这个内部分裂，无疑是给那继努尔哈赤的皇太极及其刚建立的“后金政权”许多乘虚而入的机会——这才发生了“丁丑虏祸”和“丙子虏祸”；使后金政权可以轻易地在军事上征服半岛；亦种下两个民族之间深刻的偏见。

三、“义理派”和“拘糜派”较量下，朝鲜王朝对满清王朝关系的两个极端主义

从本书第三章《“拘糜派”和义理派”斗争下，朝鲜王朝对满清王朝关系的曲折发展：“天朝礼治体系”与中国改朝换代中朝关系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一个既成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对于人们认识新形势及行为上的相应调整时，是可以发生严重的干扰与扭曲作用的。

“义理派”的议论，从现代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生理—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是很有意思的。

原来，他们是从明王朝在“壬辰倭乱”给予朝鲜王朝近似无私的援助，而对于满清政权取代朱明政权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从而把满清人看成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因此，“反清复明”亦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甚至妄想走上联合日本人和在闽台的郑（经）家军来对满清王朝发动武装攻击的道路上去。

不过，这里也反映出朝鲜人的困境：他们既然对明王朝透过“天朝礼治体系”给予半岛的军事保护，要表示无限的感激；把“义理”绝对化了，便忘记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互不干涉内政是第一大诫律。因此，“反清复明”是涉及中国的内争，更是不可逾越的“雷池”。殊不知，在唐代中叶以前，以及元王朝时代，朝中两国的纠纷，正源于一国插入了另一国的内政；纠缠不清、打成一片。而在一般的情况下，身受其害的当然小国寡民的朝鲜人。

再者，由于种族沙文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严重干扰，朝鲜人没有办法看到，“天朝礼治体系”固然同中国封建王朝有着必然的、近乎有机的联系；可是，同汉族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关键之处是，在于那个在中国大陆建立的王朝……

（一）是不是能有效地控制中国大陆；

（二）是不是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及战斗决心来维持区域秩序；

（三）是不是在内政上多少是推行礼治体系，因而在外事活动上能以礼义对待周边的国家/地区？（即，不直接地介入后者的内政）……

可以说，当万历神宗皇帝出兵拯救朝鲜人不受丰臣秀吉的侵略军蹂躏的时候，是充分说明了明廷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格来维持“天朝礼治体系”的；可是，一二十年后，当它不能抗拒满清政权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耀武扬威、东征西伐的时候，它已经丧失对“天朝礼治体系”持续领导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了。

相反地，当满洲人成功地建立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农业—农村体系并积极引进礼治主义、推行其儒化政治时，它是逐渐地取得充足的资格和能力，可以继明廷成为中国土地上的统治者；并且进而对“天朝礼治体系”取得无可争议的、理应受到第三者承认并尊重的领导权的。

实际上，满清入关之后，很快便建立对整个中国的有效统治；而且，从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等皇帝，都比明王朝的任何一个皇帝（包括明太祖、明成祖，更休谈明神宗）在进行儒化政治上，有更大的见识、更大的决心以及更大的效益性的（严格说，明王朝的皇帝，没有任何一个是合乎礼治主义对人君的要求的）。因此，如果某些朝鲜人因为明神宗的拯救之恩，一定要把“天朝礼治体系”的领导权跟某一个政治集团（明室）等同起来——特别是与一个早已被灭亡的集团等同起来，在思想上和逻辑上，可以说是荒谬的；而在实际政治上，更是无理和有害的。

在本书第四章里，人们可以看到，“义理派”的理论与实践都遭受到实际政治无情的否定。即，满清政权对“天朝礼治体系”的领导权和能力及效益性，做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再是他们高不高兴予以承认所可丝毫地加以改变的事实了。

这种顽固的抗拒，是一种“非礼”的思想感情和幼稚的政治行为；而物极必反，因此，在乾隆皇帝和正宗国王的时代，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他们两人对礼治主义和“天朝礼治体系”的框架之下，忘记了必须对“礼尚往来”在形式上和性质上，都必须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双方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之类的禁忌；否则，无异是对礼义的践踏；进而把两国的关系，变成一个“大家长”和一个“小家长”的私相授受的游戏了。

这些事具体地表现在朝鲜王朝主动而又不厌其烦地向清廷朝贡，而且，大送其礼；特别是对到达半岛的使臣诸多馈赠贿赂；另一方面，乾隆也不断地削减朝鲜的贡品，不按规矩办事。更有甚

者，在乾隆 70 大寿和 80 大寿的庆祝活动中，双方都不惜功本，热闹一番，更逾越了封建主义体系里两国君王“授受不亲”的一般的“礼义”和“礼仪”了。

四、国际关系形态中的“五理系统”处理方式

从朝鲜王朝对满清王朝关系中存在着的两个极端主义，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所谓礼治主义和“天朝礼治体系”都可视之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对朝鲜人生存发展进程中各个层面的活动，都能起着或大或小、直接间接的规范性和指导性的作用。

具体地说，当初，半岛人士从中国大陆引进汉族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某些次文化，如礼治体系者），是在于借用中国人的一整套概念、理论与方法，来处理其个人的生理—心理系统（亦所谓身心系统），使到人们可以对他/她的生理和心理（四肢、五官、感觉器官、神经系统以及行动、欲望、思想感情……）活动，有一个比较平衡稳当的处理方式（即所谓“生理—心理系统”）；从而进入那么一种身宽体胖、心旷神怡的自由自在状态。在此基础上，与其他人的交往（所谓社会活动），亦需要有一套指导交互行为、使人们相安无事的方式（所谓社会规范和社会体制）；即是本书所说的“群理系统”。

汉族文化在身心系统及群理系统的经营管理上，自有其一套十分精致的概念、理论及方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并进一步发展出一整套的东西，指导人们如何处理人和自然—超自然的关系（特别是生产活动和生态环境的处理），即所谓“物理—天理系统”（如，“参赞化育”、“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在一定意义上，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中华传统对“五理系统”处理方式的一个高度概括；这个“概括”，有其普遍性，并不是儒家的发明。

可以说，当半岛人士在中国人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建立其

小农经济和以男性—父权为中心的社会体制时，便发现汉族文化的礼治主义对于他们的社会发展是很有推动性与整合性作用的；因此，对它的引进，才开始积极起来了。

无可否认地，作为汉族文化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次文化，在一般情况下，对于一个农业—农村社会，是会有其稳定性与融和性的作用的。可是，达到了举国上下都进入“佞佛”的状态，对这个社会便产生破坏性的作用；因为，它所处理的更多的是灵性与来世的问题，而儒法两家则在实际社会生活的层面上，有一大套颇具效益性的办法——朝鲜王朝继佞佛的高丽王朝而起，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新社会，对于维护农业生产，对男性优势地位的礼治主义，便不能不大事提倡了。

“天朝礼治体系”是用来保护这个农业—农村社会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架构。

倒过来说，“天朝礼治体系”，做为一个“宏观系统”，在它之下，既有一个“中观系统”，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行为方式（即群理系统）；亦必然有一个“微观系统”，见之于一定的人格系统和思想感情表达的方式（所谓身心系统）；那么，朝鲜王朝的君臣及一般士大夫在它的笼罩之下，执着这一大套东西，用它来分析周围的事物（包括女真人动向），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此，有成百年的时间，“义理派”对满清政权充满偏见，对形势做了十分可笑的分析，反映的只是在“天朝礼治体系”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体系之下，朝鲜人食古不化，把它的某些概念、理论、方法论及模式绝对化了，便是犯了某种意义上的“教条主义”；成为一种唯心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东西——在某些“义理派”的人格系统中，具有这样的“痴迷性”，是后人从事“历史生理—心理学”研究的极佳素材呢。

这也难怪，因为，人类的一切社会文化体系是在矛盾中发展，总是在“模糊情境”和“危机情境”之间摆动的；因此，不固定

一些东西，建立一个“正常情境”，都是在流动状态，叫人无所适从；而文明就是一种矛盾对立统一，即是说，“正常情境”中总是带着几分“模糊因素”和“危机因素”——可是，这样的“相对的固定”，往往变成“绝对的固定”，这才出了问题。

显然地，同小农经济有着密切关系的礼治主义及其“天朝礼治体系”，本质上就是相对地保守，倾向于产生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因此，在它里面的种种次文化里，都有从“相对固定”趋向“绝对固定”的极端主义现象。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天朝礼治体系”在经过“壬辰倭乱”之后，没有发展新的东西出来，如以灵活方式处理建州卫女真人的问题；朝鲜人亦不能注意到它的领导权已转移到满清人身上，而及早给予后者一定的肯定。

更为严重的是，在经过 100 多年的康乾盛世之后，整个礼治体系有进一步的僵固化，所以，一旦暴露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冲击之下，便找不出一些突破性的反应模式；终于在 19 世纪中叶被这个汹涌澎湃的西潮所吞没——这可以说是它遭遇到的最后一次挑战；因为，这一次的反应失败了，根本被消灭了，也就不会再遇到什么挑战了。

五、西方资本主义及“美式文明”对“天朝礼治体系”的“最后一击”

丰臣秀吉集团和后金政权对朝鲜半岛的挑战，严格地说，不外是一种暴力的压迫；在文化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很清楚的，这两个挑战者在历史发展的阶段上，都是比朝鲜人略逊一筹；因为，无可否认，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礼治主义为其主体精神的中央集权国家，在 19 世纪以前，不愧是东亚地区最高度发展的一个文明体系。实际上，日本在丰臣秀吉之后继之而起的德川幕府，可以说，是集中地引进了礼治主义和

《朱子学》来推动“将军府”对日本列岛的广泛、直接而又有效的统治；遂为 19 世纪中叶天皇“亲政”，取得政权，推进“明治维新”制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努尔哈赤的后人，在建立了后金政权和满清政权之后，亦是以加速其儒化政治的建设，才得以稳固其统治的。

换句话说，中华传统中的礼治主义及有关的儒化政治，对于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及维持，是有一定的历史作用的。

因此可以说，只有西欧和北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东亚地平线上出现时，礼治主义和“天朝礼治体系”才遇到了它们的“克星”。在被动挨打中，土崩瓦解；以最耻辱的形式，结束它几千年的历史生命！

很清楚，礼治主义和“天朝礼治体系”对于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固然是大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及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但是无能为力，可能还有干扰性的作用。再者，对于“五理系统”处理亦不能提出一套革新的办法（特别是对个人与集体、个体与个性的发展上，不能有所突破）。

西方国家以其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严厉挑战是多方面的：

——它有一个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现代企业制度，由于科技的运用和特殊的经营管理方式，其生产力是不可限量的；这一点，同小农生产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它是利用社会契约及法治—法制主义来处理群理系统；并保护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义（即，个人对其生理—心理系统加以处理的近乎绝对的权力）；这一点，同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礼治主义（特别是强调人身从属关系及集体主义），可以说也是针锋相对的；

——由利益集团组成的外事活动及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以对弱势国家/地区进行直接的支配和掠夺为目的；这一点，使“天朝礼治体系”下的“朝贡关系”和礼仪往来变得无聊和费时失事。

可以说，19世纪末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半岛的北进政策，带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的特色；因此，可以完成丰臣秀吉集团的遗志，终于击垮“天朝礼治体系”，把朝鲜王朝沦为它的殖民地，并及于中国的东北（满洲）——那种对朝鲜人的奴役统治和残暴掠夺，比蒙古人有过之而不及，而不是半岛人士在明清两代在“天朝礼治体系”下所经验过的民族耻辱。

继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之后，半岛分裂为二；在冷战系统下，可以说，是处于两种在性质上和形式上都不同于礼治主义的西方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支配之下——而美国在这样的格局中，是居于一种支配性的地位。因为，它不但用“美式文明”塑造了战后的日本，也塑造了韩国；更有甚者，在后冷战时代，见之于对朝鲜核武器开发问题的处理手法，它还企图把“美式文明”强加在朝鲜之上呢。

六、东北亚文明抉择的“天路历程”：从19世纪，到20世纪，及于21世纪

如果，从朝鲜半岛同中国封建王朝及日本列岛的关系形态来看，人们可以了解，东北亚地区的民族转移、农业文明的发展以及礼治体系的引进，还有“天朝礼治体系”的开张，都有其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加以总结（比如它同“和平共处”及“永不称霸”的渊源）；这种探索对21世纪这个地区（甚至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新的国际关系形态的建立，是有其参考价值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东北亚地区的关系形态会是什么样子的？其具体形式是不得而知的；不过，有一些大数（大方向、大框架……）倒是可以掌握的：

其一、由于所有制多元化，使用科技和利用经济规律的现代化产业结构的建立，小农经济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因此可以看到的是，建立这么一种生产方式上的那个古老的、特殊的礼治主义